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 GEOFFREY CHAUCER

## 乔叟研究文集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肖明翰 编选



 译林出版社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 乔叟研究文集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肖明翰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叟研究文集 / 肖明翰编选.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7767-4

I. ①乔… II. ①肖… III. ①乔叟(Chaucer, Geoffrey 约1343—1400)—人物研究 ②乔叟(Chaucer, Geoffrey 约1343—1400)—文学研究 IV. ①K835.615.6 ②I56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9662号

乔叟研究文集 肖明翰 / 编选

责任编辑 韩继坤  
装帧设计 韦枫  
校对 蒋燕  
责任印制 颜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5  
插 页 4  
版 次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767-4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主编简介

##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89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文艺学。著有《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作品”）、《拉美当代小说流派》（青年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堂吉诃德的长矛》、《游心集》、《亲爱的母语》等十余部作品，并参与了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史》。

---

编者简介

## 肖明翰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学会理事。1989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英国中世纪文学、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比较文学和美国南方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承担了三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与数项省部级课题；著有《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威廉·福克纳研究》《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等。

##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

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失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模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传承和丰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二为方针”。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由二十二部学术史研究专著、二十二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辑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辑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

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第三辑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乔叟、简·奥斯丁、普鲁斯特、泰戈尔和希伯来经典。

###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 20 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 20 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

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绝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模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

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 内容简介

《乔叟研究文集》所选 19 篇文章，自约翰·德莱顿所写乔叟学术史上首篇重要文献始，以现当代代表性乔叟研究者之研究为主。这些文章主题各异，方法不同，从多个方面对乔叟其人其作展开深刻论述，如乔叟之文学地位、所受文学传统之影响、文学创作之阶段性发展、作品风格之独特与多样等；其中亦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当代思想指引下对乔叟形象的新探索，堪称对乔叟研究整体面貌和突出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

编选者序 ..... 1

《现代批评观点:杰弗里·乔叟》序言 ..... 1  
哈罗德·布鲁姆

英语诗歌之父 ..... 19  
约翰·德莱顿

古典文学对乔叟的影响 ..... 33  
理查德·L. 霍夫曼

乔叟承继的法兰西遗产 ..... 45  
阿迪斯·巴特菲尔德

乔叟承继的意大利遗产 ..... 64  
戴维·华莱士

乔叟其人 ..... 90  
唐纳德·R. 霍华德

乔叟式的现实主义 ..... 104  
默顿·W. 布卢姆菲尔德

乔叟的文体 ..... 120  
克里斯托弗·坎农

持书的男人,或者“谁画的狮子?” ..... 142  
普丽西拉·马丁

殖民主义、拉丁语之推行和抗拒性 ..... 157  
约翰·M. 鲍尔斯

梦幻诗歌 ..... 177  
A. C. 斯皮林

早期乔叟 ..... 197  
A. C. 斯皮林

乔叟的克丽西德:社会中的女人,恋爱中的女人 ..... 226

戴维·亚尔斯

中世纪阶层讽喻和《总引》 ..... 254

吉尔·曼

《坎特伯雷故事》之《总引》中的模拟化艺术 ..... 274

小亨利·马歇尔·莱斯特

《坎特伯雷故事》的戏剧性与婚姻主题 ..... 291

乔治·莱曼·基特里奇

《坎特伯雷故事》之浪漫传奇 ..... 313

J. A. 伯罗

《坎特伯雷故事》之喜剧 ..... 335

德里克·皮尔索尔

另一种风格的乔叟:短诗 ..... 354

埃丝特·卡茜尔·奎因

## 编者序

作为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保持着几项纪录,其中之一是他拥有英国文学史上最长久而且不间断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从他生前开始,六个多世纪来,文学界和学术界对他的评论和研究,尽管由于英语的巨大变化造成的语言障碍等因素,也曾在新古典主义时代出现过低潮,但从未中断过。

不过,乔叟虽然早在15世纪初就已被英格兰诗人们尊为“大师”(mayster)和“父亲”(fadir),六百多年来,他的形象却一直在不断变换;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人眼里,他似乎呈现出很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六个多世纪来的乔叟研究史就是一部乔叟形象的变迁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乔叟的形象越来越丰富,同时学者们在乔叟作品中所揭示出的“乔叟性”也越来越清晰的历史。

自与乔叟同时代的法国著名诗人德尚于14世纪80年代赞颂乔叟的诗作起,在诗人们的笔下,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在政治和宗教权威的评判里,乔叟的形象一直在变换发展,不断丰富。他被看作“伟大的翻译家”,“英语语言之父”,“哲学诗人”,“雄辩的修辞家”,“英语诗歌之父”,以及“英格兰的荷马、索福克勒斯和维吉尔”。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由于乔叟在作品里批判和嘲讽了天主教会的修士与神职人员,他被塑造成一位“虔诚的神学家”、“新教徒”诗人、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和“当之无愧的威克里夫派”;有人说他的作品“寓教于乐最富成效”,“清除我们的罪孽”并用“美德之火/点燃我们的心灵”。1542年,英国颁布法案以“清除王国内所有异端邪说”,结果绝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都遭禁止,在文学界只有乔叟和高尔两位诗人的著作被容许阅读,在可以阅读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只有《坎特伯雷故事》被专门提及。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谴责乔叟,说他的诗作“与基督和他的使徒们的教义直接对立”,教唆“淫乱”,“毒害青年心灵”,应被列为“禁书”;他们认为,阅读《坎特伯雷故事》如同“亵渎神灵、骂脏话、

的差异,几乎就是一个断裂。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但乔叟是一位天才的讽刺家,而《坎特伯雷故事》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超越了它们的历史语境。G. K. 切斯特顿指出,乔叟的讽刺那样巨大,以至有时我们甚至感受不到。不论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悲怆上,还是在承认其真正的文学前辈方面,乔叟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狡黠。但丁和薄伽丘,特别是薄伽丘,使乔叟成为可能,正如同他以其中一些相同方式使莎士比亚能为他的世界塑造相应人物一样。乔叟的故事是关于<sup>1</sup>故事之讲述,因为对于那种意识到自身是虚构的虚构作品,薄伽丘已经使其完美。那些在语言艺术上意识到它们的确是语言艺术的故事,与那些掩盖这种意识的故事,表现是不同的。很明显,乔叟那种升华了的故事意识,不论如何躲闪,都与《十日谈》有一定关系。

乔叟喜欢援引他虚构的权威,却从不提薄伽丘,但那使我们回到乔叟式讽刺。与薄伽丘不同,除非以笑话或自我戏仿的方式,乔叟不会表露他自己情感方面的意外。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向我们吐露他们的隐秘,而乔叟却把他的苦痛隐而不宣。乔叟之天才的一部分以他同自我保持距离和他那种喜剧性观察方式出现,那是莎士比亚式讽刺的先驱。乔叟的独特创作中异乎寻常的是他对性格的把握,那使巴思妇人、卖赎罪券教士甚至修女院院长(对此人我简直不喜欢!)每人都以其特有的声音讲述。成熟的莎士比亚创造的奇迹是福斯塔夫、哈姆雷特、伊阿古、克莉奥佩特拉以及他们的同伴们每人声音的个性化,而那有赖于乔叟对莎士比亚那正处于发展中的天赋的刺激。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可以说就是巴思妇人的儿子,而伊阿古绝妙的虚无主义也早在卖赎罪券教士享受自己操纵他人之力量的愉悦中表露出来。

E. 塔尔博特·唐纳森<sup>2</sup>是现代乔叟专家中最敏锐的一位,他揭示出乔叟在其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代理人形象:《坎特伯雷故事》里的香客乔叟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的叙述者。香客乔叟讨所有人喜爱:他友好、超级宽容、兴趣盎然地接受每一个与他同行的有趣的恶棍,但也总是毫不迟疑地赞美真正的美德。《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叙述者被塑造为一个想成为情人却很不幸的人,他深陷对克瑞西达的热恋之中,以至我们中

1 本文中字体变化的强调为原文所有,下面不再说明。

2 E. 塔尔博特·唐纳森(E. Talbot Donaldson),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文系资深教授,著名中世纪文学和乔叟学者。

绝大多数人（至少男人是这样）都爱上她，正如乔叟毫无疑问爱上了她一样。香客乔叟是更伟大的讽刺家，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叙述者最后竟如此地肝肠寸断，以至他超越了自己的讽刺。

## II

乔叟是那些挫败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的伟大作家之一，在这方面他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托尔斯泰相同。一些量级相似的作家——但丁、弥尔顿、华兹华斯、普鲁斯特——促使人们给予充满灵性的批评（它们处于其他大量无聊枯燥的批评之中），但乔叟，与他少有的那几位同仁一样，具有那种解除批评家武装的模仿力，使其要么无从下手，要么一切都得重新来过。关于乔叟的研究大多仅仅是历史批评，或者甚至是神学批评，似乎乔叟应该被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的超级版来阅读。但我自己并非乔叟专家，所以我是作为一个一般的文学批评家和乔叟的一位普通读者，来写这篇序言和编辑这部文集的。

同莎士比亚以及英语中很少几位最优秀的小说家一道，乔叟在表现现实上把英语语言运用得超出极限，将其带入不可想象的成功之中。卖赎罪券教士和巴思妇人，如同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一样，使当前流行的几乎所有批评理论全都遭到质疑。说卖赎罪券教士或者巴思妇人只不过是一堆比喻的构造，或者说他们所讲述的任何一个故事都几乎无限地推延其指涉，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关于《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那位最具乔叟性同时也是最优秀的乔叟批评家 E. 塔尔博特·唐纳森评论说：

这些人物形象最异乎寻常的特质是他们都充满活力，他们中每一位都给读者造成这个人物不是虚构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幻觉，所以诗人似乎不是在塑造而仅仅是在做记录。

作为一个批评论点，这是阅读乔叟不可或缺的起点，但当前各种文学阐释模式都否定这种有关活力的幻觉有任何价值。

去年 6 月，我同一个好友在法兰克福一座公园散步，他是法国一位批评理论的领军人物。我已经在法兰克福做了关于弗洛伊德的讲座；我